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博士论坛系列
ZHONGGUO GUOJI GUANXI XUEHUI BOSHI LUNTAN XILIE

国际关系理论

前沿与热点

2006年博士论坛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 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New Directions and Developments Ph.D.Candidates Forum 2006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植物学报

植物学报植物学报

植物学报

前瞻与热点

2008年博士论文

一个世纪的辉煌与贡献



植物学报

国际关系理论：前沿与热点

——2006年博士论坛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 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际关系理论：前沿与热点：2006 年博士论坛 / 中国
国际关系学会编.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1
ISBN 978 - 7 - 5012 - 3082 - 2

I . 国... II . 中... III . 国际关系理论—文集
IV . D8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6439 号

责任编辑 袁路明

文字编辑 何以多

责任出版 赵 珍

责任校对 马莉娜

封面设计 徐威明

书 名 **国际关系理论：前沿与热点**
——2006 年博士论坛

Guoji Guanxi Lilun: Qianyan yu Redian——2006 Boshi Luntan

作 者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 编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印 刷 北京京晨纪元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787 × 1092 毫米 1/16 13 1/4 印张

字 数 240 千字

版次印次 2007 年 1 月第一版 2007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简介

撰稿人（按发言顺序排列）

- 惠耕田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生
李开盛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
孙吉胜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生
刘丰 南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博士生
周方银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博士生
尹继武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刘宏松 复旦大学公共事务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杜娟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饶淑莹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博士生
杨旗 南京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博士生
曲博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评论人（按姓氏笔画排列）

- 王正毅 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经济系主任，教授
王逸舟 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刘永涛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
朱立群 博士生导师，外交学院院长助理，教授
张清敏 外交学院外交系副教授
张睿壮 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教授
李少军 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室主任，研究员
胡宗山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国际事务研究所副教授
唐小松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交学系教授
秦亚青 博士生导师，外交学院副院长，教授

袁正清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郭树勇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阎学通 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教授

交流思想 砥砺学问

——在首届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博士论坛上的致辞

秦亚青

外交学院、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政治所联合举办 2006 年博士生论坛，有三个目的。第一，搭建博士学术交流的平台。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努力，认真地学习，吸收、消化、创新。尤其是国际关系专业的博士生，思维活跃、思想开放、勤奋努力，已经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一支重要的学术力量。搭建一个博士生交流的平台，是为了大家能够砥砺学问，激活思想，启迪智慧，进一步推动我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提高我们的学术水平。第二，开拓校际师生交流的渠道。平时，我们在自己的学校里读书研究，和本校的老师比较熟悉，与其他学校的老师则多是通过文章认识的。今天，我们请来一些国内知名的学者和专家，让他们来做点评教师。希望点评和大家的发言讨论能够成为一种平等的交流，能够真正从这些交流之中撞击出思想的火花，催生学术的灵感，并使其在今后的学习研究中发扬光大。第三，启发国际关系学科的学理研究。这一次所选的论文都是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前沿问题，有沟通行动理论、规范研究、语言学建构主义、认知心理学等等，很多都是国内研究人员还没有深入研究的课题。博士研究生连同他们的指导教师敏锐地捕捉到这些研究取向，并开始认真研究。虽然不少选题还是刚刚起步，但我们希望这些成果能够启发大家的思考，使这些研究能够进一步深入下去。

值此机会，提几点希望。首先，要有兼容并蓄的开放心态。学术发展成长的最重要氛围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术信念和偏好，但只有在一种多元氛围中、在思想的交锋中、

在学问的争论中，优秀成果才会闪烁光芒，优秀人才才能脱颖而出。所以，我们的论坛，既应该是交流、学习、启发、讨论的论坛，也应该是反思、质疑、辩论、争鸣的论坛。其次，要有严谨认真的学习风气。有人说，中国学界进入了浮躁时代。不仅仅是做飘浮的学问，还有抄袭和剽窃。我们的论坛倡导的恰恰是一种严肃的学习风气，是一种严谨的治学精神，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出真正的学问来。第三，要有超越前人的学术志向。国际关系学科在世界上仍然是落后的学科，在中国也是起步很晚的学科。要做的事情很多，可做的事情也很多。我们今天请来了一些优秀的学者，他们为中国国际关系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希望，年轻一代要超越前人，否则，学术就会停滞。从这次论坛上的一些论文来看，博士生的学术潜力是很大的。当然，远大的学术志向必须建立在扎实深入的学习和研究之上，使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样才能开创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新的天地。

今天，一些重要出版社和期刊的编辑也来了。他们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看一看世界上国际关系领域的旗舰杂志，几乎所有的学术论争都是它们挑起的，而正是这些学术论争推出了新的理论、推出了新的学者，也推动了学科的发展。我们希望他们一如既往地支持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尤其是支持年轻的优秀学者，使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研究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预祝论坛圆满成功。

『年轻意味着希望与挑战』

——在首届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博士论坛上的致辞

王逸舟

“年轻意味着希望与挑战”。

在这个场合，面对来自国内高校的博士生代表，用上面这句话，我想表达两层意思：

其一，在中国，国际关系学是一门方兴未艾的学问。在发达国家，国际关系学的出现仅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情，距今不过80多年，它与文史哲政经法等大学科相比确实像“小兄弟”。国际关系学在中国的成长更有新的含义。过去的二十多年，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年代，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启蒙阶段，是新一代中国学者“白手起家”的时期。在此之前，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带有浓重的极左意识形态色彩，理论学术研究带有“注释学”的味道，学科理论即“理论的理论”是不存在的；在那以后，出现了全新的局面：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气氛相适应相一致，国际关系研究、特别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走上了生气盎然的探索之路，改革开放之后上大学的一批年轻人（所谓“77级”和“78级”）充当了主力，开拓出如今这种充满机会、希望无限的局面；即便是参与这一伟大创造过程、对年轻学者有极大提携和鼓励的老一代学者，也只是在这一时期才有独立的思索与研讨，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所以，毫不夸张地讲，中国国际关系学是一门年轻的学问，一门主要由年轻人创造的学问。离开年轻人的想象力、批判意识和活力，不会有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今天。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还是如此。正像毛泽东所说，“青年人就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在你们身上。

其二，在中国，国际关系学子尤其任重道远。

首先要承认，中国国际关系学发育得很不充分，还有许多有待开垦的处女地；不用说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大学科相比，哪怕与国外同行对照，我们做得也十分不够。对此千万不要掉以轻心，绝对不能让虚骄之气蔓延。其次我想说，对于在座各位而言，写一、两篇有新意的论文不难，难的是长期坚守认真做学问的态度。我曾经见到一些很有才华的年轻朋友，由于各种原因，半道退出了学术领域，让人十分惋惜。在我们这个学科，只要你有中等以上的才智，加上虚心的学习态度和坚强的毅力，沿着正确的路径，最终是一定能够成才、在这个领域做出贡献的。尤其是一些重点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硕士生、博士生，外部环境和自身条件都很优越，成功与否关键取决于你自己的意志和毅力。切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好高骛远却不脚踏实地。中国正在和平崛起，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时代需要很多有才华、有抱负、又有勇气、有毅力的国际关系研究人员和教师，我衷心期待你们，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目 录

交流思想 砥砺学问 / 4	
——在首届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博士论坛上的致辞	
秦亚青	
“年轻意味着希望与挑战” / 6	
——在首届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博士论坛上的致辞	
王逸舟	
沟通行动理论与国际关系研究 / 1	
规范理论：批判与评估 / 18	
国际关系的语言转向与建构主义的发展研究：以语 言游戏为例 / 34	
实证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对内部与外部论争的评述 / 52	
Formal Models 与国际关系研究 / 73	
认知心理学之于国际关系研究：进步及其问题 / 89	
国际组织的自主性行为：两种理论视角及其比较 / 114	
国际制度的理性设计论：理性主义国际制度研究的 新发展 / 129	
西方学界的帝国理论研究及当今热点 / 148	
世界体系理论的知识谱系 / 165	
开放经济政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新进展 / 177	
后 记 / 198	

主持人：李少军

发言人：惠耕田

点评人：刘永涛 袁正清

沟通行动理论与国际关系研究

惠耕田

一、研究背景：从批判理论到建构主义

（一）法兰克福学派与国际关系研究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社会学理论属于社会学三大传统中的批判传统。作为批判取向的社会科学，其主要是基于人类解放的认知旨趣，其目标是反思和批判。^①但是作为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军人物，其社会理论不同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前代学者。霍克海默认为批判社会理论应该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其分析和批判社会的目的最终在于促进和支持具有解放性质的社会转型。而阿多诺则分析为什么解放性质的社会转型无法实现，其批判矛头指向西方文明进程中的工具理性。正是这种工具理性使人们无法逃避社会中的支配和恐惧。^②而哈贝马斯则发展了基于沟通行动的社会批判理论，强调的不是在生产关系而是在

^① 黄瑞祺：《社会理论与社会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社会学三大传统分别是实证社会学、解释社会学和批判社会学。具体内容参见黄瑞祺：《社会理论与社会世界》，第3—31页。

^② Richard Wyn Jones, “Introduction: Locating Critic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Richard Wyn Jones ed. *Critical Theory and World Politics*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2001), pp. 6 – 7.

人类沟通中的解放潜能。^① 基于普遍语用学的原理，沟通中的语言使用本身就会产生言语行为，促使人们超越工具理性，重建现代理性。人类具有言语行为能力，这在人类行动的研究中是不能忽视的。也正是以普遍语用学为突破口，哈贝马斯建立了自己的沟通行动理论，提出了话语伦理。^② 虽然其理论仍然是以人类解放为认知旨趣的社会批判理论，所不同的是，不同于前代学者，其沟通行动理论为人类解放指明了方法和道路，这就是在人类社会中建立话语伦理，倡导商谈式民主。

有趣的是法兰克福学派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其内部演变的轨迹也反映到了国际关系领域中相应的应用研究上。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新现实主义越来越难以解释迅速发展的国际政治现实。在国际关系本体论、认识论和研究方法论上，新现实主义都遭到了质疑。受欧洲后现代哲学以及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社会学传统的影响，在国际关系学界掀起了一股“批判风暴”。^③ 其中受法兰克福学派影响的阿什利在 1981 年发表论文《政治现实主义和人类旨趣》，指责新现实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基于“技术统治旨趣”国际关系理论。科克斯在 1981 年也发表论文《社会力量、国家和世界秩序：超越国际关系理论》，指出新现实主义是一种“问题解决理论”，本质上服务于一定的权力意图和政治目标。^④ 1986 年出版的《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收入了科克斯和阿什利的文章，显示了主流学派同批判理论等非主流学派进行对话的姿态。但是到了 1993 年鲍德温主编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当前的辩论》发表

^① 马克思注重的是基于物质生产实践中人与人之间形成的生产关系，而哈贝马斯则注重人与人之间基于言语互动的沟通行动，但其最终目的都是追求人类解放。因此，哈贝马斯以新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关于两者之间的区别，参见韩红：《交往的合理化与现代性的重建：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深层解读》，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 42—49 页。

^② 关于普遍语用学与沟通行动理论，参见黄瑞祺：《社会理论与社会世界》，第 158—198 页。关于话语伦理，参见韩红：《交往的合理化与现代性的重建》，第 109—119 页。

^③ 国际关系学中广义的批判理论包括后现代批判理论、建构主义批判理论、女权主义、世界体系论，也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参见 Alexander Wendt,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Summer 1995), p. 71. 为行文方便，本文中用社会批判理论专指法兰克福学派的国际关系批判理论，以示与其他批判理论的区别。关于批判理论的狭义与广义之分，参见郭树勇：《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长征出版社，2001 年版，第 34 页。对国际关系影响深远的批判理论主要有两支，其一是法兰克福学派，其二是葛兰西新马克思主义。前者影响林克莱特较深，后者则主要影响科克斯。参见 Jones, p. 5.

^④ 阿什利的批判理论主要受后现代哲学影响，但在认知旨趣上则接受哈贝马斯的分类。科克斯的批判理论更多是受葛兰西影响，但其“问题解决理论”与“批判理论”之分则接受霍克海默的理论分类方法。参见郭树勇：《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第 36—37 页。

时，非主流学派被边缘化，学理论战重新回到了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性主义范式内辩论，主要争论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等问题。^① 批判理论之所以被边缘化，一方面源于基欧汉的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的分类，^② 这让人误认为反思主义是反理性的，因此无法提出有效的研究纲领。另一方面，80年代中期，从法兰克福学派汲取资源的社会批判理论日益钝化，为更为激进的后现代国关理论所替代。^③ 后现代理论旨在解构和颠覆，无意于建设，也不指望进入主流。因此，20世纪90年代国关理论的发展使建构主义应运而生，建构主义认同批判理论的本体论，但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向主流理性主义理论靠拢，力求在反思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寻找中间道路。^④ 因此建构主义逐渐从批判理论中分离出来，^⑤ 开始有意识的建设自己的理论体系。

（二）美国与欧洲的建构主义研究

但是，建构主义的发展在欧洲和美国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局面。在欧洲，建构主义研究重回法兰克福学派传统，主要借鉴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在美国更趋理性的建构主义学者更加注重理论的建设和实证研究，并出现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⑥ 但是这些研究都有一个缺陷，就是在结构和行为体之间往往带有结构偏向。不管这种结构是文化、身份还是规范，其探讨的问题都是结构如何影响行为体的行为。但是建构主义的基本假定是结构和行为体的互构，行为体建构结构，结构也建构行

^①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译者前言，第19页。

^② 关于基欧汉对国际关系理论中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的分类，参见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in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Boulder: Westview, 1989), pp. 158–179.

^③ 郭树勇：《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第40页。

^④ Emanuel Adler, “Seizing the Middle Ground: Constructivism in World 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3, No. 3, 1997. 温特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就是一种典型的中间道路，其建构主义理论在本体论上与反思主义一致，但在认识论上坚持科学实在论，这与理性主义保持一致。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译者前言，第34页。

^⑤ 关于建构主义与批判理论的区别，详见 Ted Hopf, “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1 (Summer 1998), pp. 182–185.

^⑥ 这些成果有 Martha Finnemore.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Peter Katzenstein, eds.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Audie Klotz. *Norm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Struggle against Apartheid*.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为体的身份和利益，两者是同时进行的，是双向的建构关系而非单向的因果关系，这种双向互构是单向实证研究所无法解决的研究难点。这一原因导致了行为体和结构的互构机制这一研究盲点。欧洲学者切克尔指出，在建构主义的经验研究中行为体的施动性被忽视了。^① 这与建构主义的结构与行为体互构的假定并不一致，建构主义的实践本体论在研究中并没有很好贯彻。如何解决这种研究尴尬呢？看来反思主义的本体论加上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是要付出代价的。

为使建构主义不仅仅成为一种社会理论，而且还可以成为成熟的国际关系理论，必须正视结构和行为体的互构机制这一问题，也就是要寻找行为体以结构为背景进行互动的微观基础。依据符号互动理论，一个完整的最简单的社会互动过程包含教示、学习、定位回应和再回应四个阶段。^② 但必须承认符号互动中行为体处于失言状态，也就是说行为体不具有言语行为能力，而且是以单方理解的方式互动的，这显然有悖于国际政治的现实。国际政治现实是行为体使用言语进行交流沟通，寻求共同理解以解决分歧和矛盾。使用军事冲突作为手段解决矛盾虽然存在，但并不是政治的常态。在沟通行动中，借助言语行为，行为体的反思性和能动性得以充分体现。这里并非结构决定行为体，也并非行为体决定结构，单纯的强调结构或行为体的决定作用都是形而上的命题。真正决定行为体行动的不是结构，而是行为体在沟通中对结构的共同理解。正是这一对结构的共同理解决定了相关的行动。于是在结构与行为体之间，便找到了一个中介变量，这就是沟通中行为体对结构的共同理解。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不同情况下，对结构的共同理解可能并不一致，所以研究的重点并不是发现整齐划一的行为规律，而是对具体行动

^① 关于施动性被忽略的原因，参见 Jeffrey Checkel, “The Constructivist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orld Politics* (January 1998), pp. 341–342. 在该文中，切克尔指出了建构主义经验研究的不足，这种不足主要体现在行为体与结构的互构在具体研究中的难以操作。表现在温特研究重点是观念结构如何影响国家行为，菲尼莫尔国际制度如何影响国家利益的确定，卡赞斯坦则探讨文化、规范和身份如何影响国家安全，克罗茨则分析人权规范如何建构国家行为。因此建构主义经验研究都是探讨结构如何影响行为体，关于行为体如何建构结构则鲜有涉及。欧洲学者泽富斯也批评温特没有首先考虑国家本身的构成，而是预先假定了国家身份的存在，这造成了对国家能动性的忽视。参见 Maja Zehfuss,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Politics of Re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89.

^② 关于符号互动论，参阅郭树勇：《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第 173—179 页。

意义的理解,^① 所谓的因果关系只是具体的因果关系,^② 而非规律意义的因果关系。要追踪具体的因果关系和行动的意义，就必须关注沟通进程，这更接近于阐释学的研究方法。

沟通行动理论引入到建构主义研究，恢复了实证研究中被压抑的行为体的能动性，纠正了建构主义研究中的结构偏向，解决了行为体与结构互构的分析难题，奠定了建构主义的实践本体论，成功的确立了社会规范在行为体社会化过程中得以内化的微观基础。正是通过沟通行动，社会规范得以内化并再造，行为体社会身份也得以确立并延续。由于沟通行动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因此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在德国学界一批学者开始借助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研究国际关系，^③ 掀起了一场理性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之间的争论。但这种沟通理论的应用研究也只是在德国和欧洲非常流行，沟通行动理论在美国学界并没有被进行系统的研究。尽管像克拉托赫维尔对规范的研究在美国学界有一定影响，但是美国学界并没有重视来自言语行为的沟通行动分析。^④ 因此，沟通行动理论在国际关系领域里的应用研究更多的体现了一种欧洲色彩。Checkel 认为欧洲的建构主义研究注重对行动的理解，是一种阐释学研究方法；而美国建构主义研究更多的受社会制度主义的影响，重在探讨文化、身份和规范对施动者行为的影响，是一种对行为的实证研究。^⑤ Thomas Risse 认为在德国学界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争论的焦点是行动的结果性逻辑还是论争性逻辑；而在美国学界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争论的焦点则是行为的结果性逻辑还是适当性逻辑。^⑥ 美国学界和欧洲

^① 行动（action）不同于行为（behavior）。行动含有社会性，具有主观意义，而行为没有社会性，表现为刺激反应模式。对行为的研究着重其规律的发现，对行动的研究注重其意义的探索。关于二者的区别，详见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16 页。还可参见黄瑞祺：《社会理论与社会世界》，第 191 页。

^② 马克思·韦伯认为社会科学中没有规律可言，只有具体的因果关系，规律具有必然性，具体因果关系则具有“客观可能性”。参阅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第 112 页。

^③ 这些学者主要包括 Harald Muller, Gerald Schneider, Otto Keck, Thomas Risse – Kappen, Michael Zurn, Michael Muller 等人。这些学者的文章主要用德语发表在 1994 年到 1997 年间国际关系学刊上（ZIB,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④ Thomas Risse, “Let's Argue!: Communicative Action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Winter 2000), p. 7.

^⑤ Jeffrey Checkel, “Social Constructivisms in Global and European Politics: a Review Essa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4), pp. 230 – 231.

^⑥ 关于结果性逻辑、适当性逻辑和论争性逻辑，参见 Thomas Risse, “Let's Argue!: Communicative Action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Winter 2000), p. 4.

大陆学界之所以出现如此的差异，笔者认为主要是美国的科学传统和欧洲的人文传统的不同造成的。因为沟通行动理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在欧洲最受青睐，所以目前主要的研究成果都集中在欧洲，大部分学者也都是欧洲人。其研究领域涉及欧洲一体化、欧盟东扩、欧盟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以及欧盟治理等领域。^①

二、研究合理性论证：国际关系中的 公共领域与生活世界

(一) 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

哈贝马斯认为，社会行动可分为四种类型。^② 目的行动、循规行动、戏剧行动和沟通行动。目的行动针对客观世界，以手段达到目的，行动遵循结果性逻辑。当在互动中把他人的动因算计在内时，目的行动就会演变成战略行动；循规行动针对社会世界，行动符合社会规范，遵循适当性逻辑；戏剧行动针对主观世界，意在表达主观感受。而沟通行动所涉及的是至少两个以上具有言语行为能力的主体间的互动，这些主体使用口头的或口头以外的手段，建立起一种人际关系。行动者通过行动语境寻求沟通，以便在相互谅解的基础上把他们的行动计划协调起

① 这些成果有：Erik O. Eriksen, Integration and the Quest for Consensus. www.arena.uio.no/cidel/workshop_Firenze/Contr_Eriksen.pdf. Reflexive Integration in Europe. www.arena.uio.no/publications/wp04_20.pdf.

Frank M. Hage, Constructivism, Fuzzy Sets and Small-N: Revisiting the Conditions for Communicative Action. www.compasss.org/Hage2005.pdf.

Helene Sjursen, Towards a Post-national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http://netec.ac.uk/adonetec-cgi-bin/get_doc.pl?JustifyingEnlargement:PastandPresent. www.arena.uio.no/cidel/workshopMadrid/JustifyingEnlargement.pdf.

Jurgen Neyer, Discourse and Order in the EU: A Deliberative Approach to Multi-Level Governance. www.arena.uio.no/cidel/workshop_firenze/contNeyer.pdf.

www.arena.uio.no 网站上有大量应用沟通行动理论进行欧盟研究的学术成果。

② 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第 319 页。